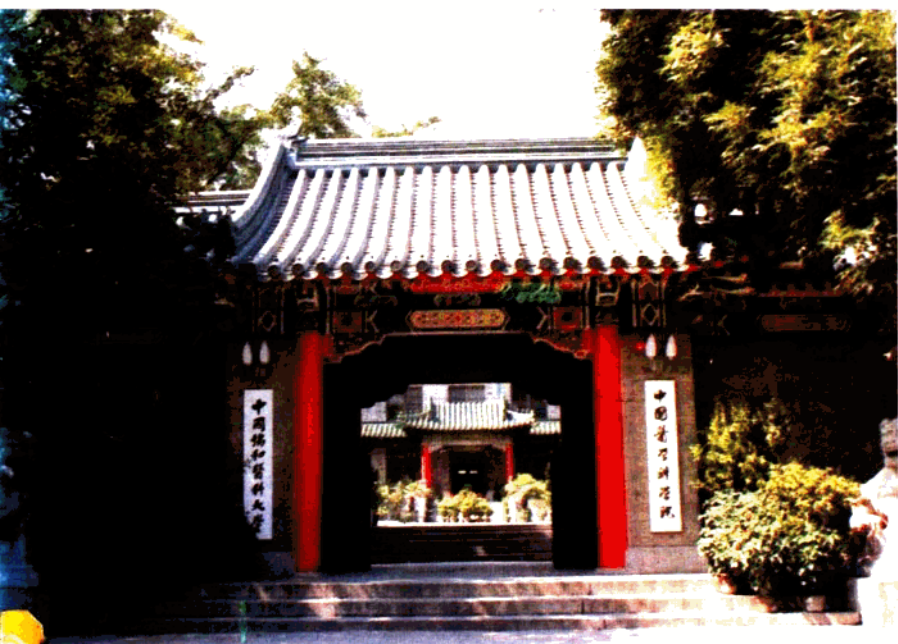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人物荟萃

(第一集)

执行主编 吴崇其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序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下称协和医大)至今已走过了75年的历程。追述历史,上溯到协和医学堂,协和女书院,则她的历史更为悠久。

协和医大对中华民族医学事业的发展、对中国医学科学和卫生保健事业的建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协和医大是医学家摇篮,她以高标准、严要求著称,她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具有真才实学,作风严谨,思维周密,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诲人不倦的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他们对事业、对人民极端负责任的精神,他们所开拓创造的成果,都已或先或后地载入了中国医学历史的史册;他们播种的桃李,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硕果累累;他们的丰厚著作,已构成了我国医学百科全书。

我虽然不是协和医大的毕业生,但我想往过和仰慕过她。自我踏进这所堪称为“医学殿堂”的大门,迄今已15年了,在这所学校工作、学习,实在得益匪浅。为了让社会和更多的同道们,尤其是医学界的年轻朋友们了解这所大学对于中国医学科学建设发展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了解认识医学科学家、教育家、医学管理工作他们自身成长的艰苦道路、卓著的贡献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今天推出了第一卷《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人物荟萃》这部著作。

本来应为20名人物,可惜在投递中丢失了一篇原

稿。入传的 19 名人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了 50 年以上,他们有的还在顽强拼搏,积极进取,有的虽已退居二线,依然在为医学科学的发展操劳,有的虽已过早地谢世,但他们的精神则在医学界熠熠闪光。

这十几篇传记都是后人们或下级、或学生、或助手们撰写,因为开作时间短,作者工作繁忙,利用业余时间撰写,加之手头材料不很齐全,水平有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祈请读者补充、指正。

顾方舟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目 录

永恒的楷模

——记解剖学家·医学教育家张鑒(1890—1977)

..... 陈克铨(1)

协和泰斗

——记内科学家,张孝骞(1897—1987)

..... 金大韵 张燕(9)

赓培桃李,风范千秋

——记医学生理学先驱、著名生理学家张锡钧

(1899—1988)

生命的保护神

——记妇产科专家林巧稚(1901—1983) ... 郎景和(27)

专解“谜底”的科学家

——记微生物、免疫学家谢少文

..... 陆秀芳 孙志毅 吴安然(35)

医师之师,管理之师

——记著名病理学家、行政管理学家白希清

..... 夏忆南 岳颖(45)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记老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医学科学家沈其震

..... 杨崢(57)

红色的真谛

——记著名血液学专家邓家栋

..... 一兵(69)

拳拳报国心

——记著名医学家、医学教育家黄家驷(1906—1984)

..... 王家腾(79)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光这边好

——记著名胸部与心血管外科先驱吴英恺

..... 吴崇其(85)

医林乔木盛,海外飞鸿高

——马海德传略(1910—1988) 江澄 叶干运(97)

满腔热血情·拳拳赤子心

——记肿瘤学家、肿瘤放射治疗学家吴恒兴

(1912—1986)..... 李保荣(107)

白衣天使,情洒人间

——记护理专家林宝善..... 吴欣娟(115)

竞竞岐黄术,拳拳济世心

——记著名中医专家祝谌予..... 董振华 季元(121)

青山作证

——黄乎同志传略..... 毛惠华(129)

“丰碑”慧眼识伯乐,思维辩证贯平生

——记当代泌尿外科学家吴阶平..... 方正(139)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

——记著名心脏病专家陶寿淇..... 邵澜(153)

弹指一挥间,奉献六十年

——李子和传略..... 林国清(163)

我爱您·中国

——傅 莱传略..... 林长胜(171)

永恒的楷模

——记解剖学家、医学教育家张謇

陈克铨

张謇(1890—1977)是我国著名的解剖学家、医学教育家、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十九世纪初叶,他即涉足于我国的医学教育事业;40年代,他以丰富的解剖学资料驳斥了国外某些学者的种族偏见,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50年代,他出任中国解剖学会理事长,为培养人才、建设学科呕心沥血,促进了新中国解剖科学的巨大发展。张謇教授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与教育事业,他光明磊落、正直无私,在后人的心中竖立起永恒的楷模。他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张謇教授1890年农历12月27日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在他少年时代,正值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之际,中国人民的苦难使幼年的张謇萌发了读书救国的思想。念了几年私塾以后,15岁那年,他在亲友的资助下,东渡日本求学,1911年,他毕业于日本东京慈惠医科大学。后来,他又两次去美国深造,一次是1921至192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人体胚胎学;第二次是1933至1934年,在美国纽约大学理学院生物系及卡纳基研究所进修人体组织学。在此期间,他被接纳为美国解剖学会会员,多次在该会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受到国际上的重视。

张謇教授一生为自己的祖国奉献了全部的学识。早在他从日本学成回国以后,即投身于我国的医学教育事业,积极参加医学院校的创建。他先后在江西医专、直隶医专、湘雅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东南医学院和上海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担任

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教授。曾任上海医学院教务主任，协和医学院教务长及后来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实验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主任、形态系主任，一级教授。

张鋈教授有深厚的国文修养，且精通日、英、德三国文字，学识渊博。6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他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教学经验。他能独自一人为医大学生开四门专业课（局部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体质人类学）。在讲授解剖学课程的时候，他擅长运用左右两手在黑板上作图，以红、蓝、黄、绿、咖啡色等不同的彩色粉笔，分别显示动脉、静脉、神经、淋巴管和肌肉等，从体表开始直至骨骼、体腔，逐层阐述人体结构及各组分的毗邻关系，形象生动，立体感强，每次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在胚胎学的讲授中，他创造了立体重塑法，按照各个水平上胚胎切面的组织学毗邻关系，分别放大描绘到腊盘上，自头侧到尾侧，将各个腊盘连成一体，把一个难以掌握的课程，变得易于理解和记忆。

张鋈教授在人才的培养上，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怀，始终注意培养和教育青年做正直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四十年代初，张鋈就对他教过的医学生说：“如果你们学医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将来挂牌、赚钱，那么我劝你们立即离开这个上海医学院。”他常常对和他一道共事的青年人说：“一个人不应为了个人的名利千方百计，而是对工作要开动脑筋，努力参加社会实践。”他特别强调团结合作，他说：“大家目标相同，没有不团结的道理。不团结是由于自私自利，私心作怪。”50年代，当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他曾经深情地写道：“人民时代的科学家只有一个目标——为人民服务。”他自己就是这样，用行动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目的。

为了培养出更多的医药人才，张鋈教授将毕生精力倾注到医学教育事业上，把他丰富的解剖学知识传授给一批又一批学生。他不仅为医学院校学生讲课，还积极主张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培训不同层次的人员。特别在解放以后，他于1951年在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举办了全国性的中级医专解剖教师进修班，此后，又组织了数

届地方的和部队的高等医学院校解剖学师资训练班(高师)各种短期进修班和研究生培养、在职干部培养等,为我国培养大批解剖学人才、壮了解剖工作者队伍。其中,他的很多学生已经成了国内外有名的专家学者,不少成为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或医药院校的领导人,他们正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卓有成效的贡献。

为了培养人才,张鋈教授编写了大量的解剖学教材。1953年为全国医士学院撰写了教本《解剖学》,1960年受卫生部委托主编了供医疗、儿科、卫生及口腔专业用的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科书《人体解剖学》,该书于1962年再版,迄今仍是我国人体解剖学的重要参考书。

为了培养人才,建设和发展学科,张鋈教授于1947年和其他几位解剖学家发起组织了中国解剖学会,创建了《解剖学报》和《解剖学通报》。他先后担任了中国解剖学会第四届、第五届理事长,中华医学会理事,《解剖学报》主编等职。通过学会和学报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团结全国解剖学工作者开展学术交流,提高学术水平,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在学术上,张鋈教授注意发扬学术民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有两件事,人们是难以忘记的。1952年,在一切向苏联学习的浪潮中,生物学界流行着苏联某学者的“活质学说”,认为活质形成细胞,当时的医学和生物学教学中,都普遍地宣传着这个观点,以此作为理论准则。这时,《解剖学报》接到了一篇与“活质学说”观点相悖的论文,事关对苏联的态度,能否公开发表。作为学报主编,张鋈教授明确表示,学报刊登的是学术论文,不同学术观点应该允许讨论,该论文终于得以发表。60年代,围绕经络的实质问题曾出现过一场争论。国外有人声称,发现了“凤汉小管”和“凤汉小体”,张鋈教授看到有关的论文后,提出了异议。尽管该国与我们是亲密的兄弟友邦,但学术就是学术,科学的东西只能以事实为依据,张鋈教授坚持了他一贯的严谨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实验研究,都证明了“活质学说”与“凤汉小体”纯属虚构。

在科学研究方面，张颢教授同样作出了许多贡献。他在国内外科技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论文，涉及到器官的胚胎发生、组织和细胞培养、细胞免疫、创伤修复和功能解剖学等方面。解放前，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祖国和发达的日本、美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差异，激发了他的民族志气，要奋发图强。但使他不能忍受的，是他听到了洋人对中国的“人种低劣”的诬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刺激了他，要用自己的解剖学知识来驳斥某些帝国主义分子的谬论。当时，那些持有种族偏见的人，以不可靠的资料作依据，断言中国人脑更接近于类人猿，这使张颢教授极为愤慨，他和他的学生齐登科教授一起，在1941年抗日战争的艰难条件下，勤奋工作，观察研究了大量中国人脑的形态，以丰富的解剖材料，总结成《中国人脑的沟回》一文，发表在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上，维护了民族尊严。这篇论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

张颢教授是把组织培养技术引进到我国的前驱者，在他主持实验医学研究所形态学系工作期间，调进这方面的人才，设立组织培养研究组，从事实验研究，培养专门人才，为全国输送出一批专业骨干。解放初期，他看到了免疫学发展的前景，率先开展了免疫组织学的实验，观察异体蛋白引起机体的组织形态学变化，该项研究结果多次为国内外学者所引述。50年代后期，在攻克疑难杂症、赶超世界水平的大跃进激流中，他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指示，组织全系人员学习中医学理论，指导年轻同志进行穴位解剖和针灸作用机理等各种研究，是我国西医学界最早开展这方面工作的专家之一，并在全国针灸经络学术讨论会上率先发表了论文。他还积极地组织力量，筛选中草药，研究烧伤，他所负责的再生和创伤修复课题，取得了很大成绩。他积极支持年轻人提出的“皮浆植皮”的设想，帮助他们进行实验研究，使自体碎皮点成功地移植到大创面上，通过再生，进而覆盖到整个创面，给大面积烧伤患者的植皮提供了新的措施，突破了以往至少需要“邮票”大皮块的旧框框，大大节省了自体皮肤。在这个基础上，我国的临床工作者又进一步发展为现在的

“自体皮点与异体皮肤镶嵌植皮法”，对烧伤治疗作出了重要贡献。30年代，他又带领研究生，从功能解剖和比较解剖学的角度，进行有关关节内软骨的研究，通过对膝关节、颞下颌关节、胸锁关节和腕关节这四个关节的关节内软骨的局部解剖及组织学观察，论证了形态决定功能，功能反映形态并影响形态的辩证观，倡导在我国发展功能解剖学研究。此外，他还指导青年解剖学工作者在骨学、肌学、脉管学方面做了一系列研究工作，获得了不少成就。张盥教授十分注意对青年人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凡是来形态学系工作或进修的新人，他安排的头一件事，就是掌握好磨刀、刷瓶、切片的基本功。磨出的刀刃要达到刀一碰头发就断的程度，刷出的瓶子要做到瓶壁上不挂水珠，切出的片子要厚薄均匀结构完整不见刀痕。他还特别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结合社会实际的需要。他曾经批评过一位勤于研究老鼠胡须的专家说，这到底有什么用？而当有人问他，“如果让您现在改行去做外科大夫您干不干？”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是国家需要，人民需要，我就去拿手术刀。”

是的，张盥教授对祖国和人民充满了深情。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特别是在1951年，他已年逾花甲，还率领中国人民慰问团第一分团赴朝慰问前线指战员。回国后又热情宣传志愿军的光辉业绩，积极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除自己捐款外，他还组织形态学系的全体同志，一起制作教学用组织切片，将出售后的收入全部捐献给国家，为志愿军购买飞机大炮。同时，他明确支持人民政府向协和医院借用200张病床收治志愿军伤病员，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热忱。张盥教授长期担任实验医学研究所所长职务，他与党总支部书记一直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彼此信任。他曾经肯定地回答个别人向他提出的问题说：“我有职有权。”

张盥教授为人正直，襟怀坦荡。在院、所的领导岗位上，他敢于负责，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与党、政领导一起，为使中国医学科学院在我国的医药卫生事业中发挥“火车头”作用，为使实验医学研

究所在基础医学的研究中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处处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不论是上班、上课或开会,他从不迟到,从不早退;他坚持站在教学第一线,直至1966年医大停办,他总是亲自为医大学生讲课;他坚决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少而精”的教学原则,不超学时不拖堂。对于同志的缺点,他敢于直言,以理服人,不以感情论亲疏。每个受过他批评的同志,不仅没有怨言,而且深深感到是对自己的帮助和教育。他常把自己的稿酬资助给解剖学会,作为学会活动经费的一部分;他还多次资助经济困难的同志解决子女求学和其他生活上的急需。系里的年青人结婚,他都要送上一份纪念品,表示祝贺。其实,张鋈教授自己并不宽裕,他子女多,有的身体不好,有的工作不理想,他从未向组织伸过手。他唯一请求组织上帮助的,是希望找到在台湾的儿子。他真诚地期望祖国的统一。张鋈教授光明磊落,待人以诚,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作为中国解剖学界的学术权威,作为院、所的行政负责人,即使在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人给他贴过一张大字报。相反,他倒在“派仗”最激烈的日子里,写了一张“大字报”,希望实验医学研究所的两派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完成科研任务和教学任务。提起张鋈教授,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张大夫”,没有一个不为他的高尚品德和为人所折服。

我国解剖学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解放后所取得的成就,凝聚着张鋈教授的辛勤劳动。现在,解剖学界的著名专家、教授,不少就是当年由他亲自授课或指导的学生。对于解剖科学今后的发展,张鋈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建议今后在大体解剖学方面,应逐步摆脱纯形态的观察,而深入到对形态发生因素的研究中去,并探讨利用这些因素来改变形态的可能性,即进行功能解剖学研究的问题。反映在显微镜解剖,即组织学和超微结构的研究方面,应尽量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把用一般技术方法所不能显示的结构显示出来,并阐明其机能意义,把功能和形态结合起来。在弥留之际,他仍然想着一生为之奋斗的解剖学事业。他深情地嘱托当时担任中国解剖学会秘书长的薛社普教授,把《解剖学报》复刊,把中国解剖学

会重新活动起来。

作为我国现代人体解剖学的开拓先驱和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张崑教授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我国的医学和解剖学事业。他的学术贡献是我国的宝贵财富，他严格的科学作风和崇高的品德深深赢了解剖学同仁的尊敬和爱戴。我们永远怀念他，学习他，在他的精神鼓舞下，做好工作，繁荣和发展解剖科学以致整个医学事业，为把张崑教授一辈子钟情的祖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竭尽力量，寄托我们对张崑教授的哀思。



协和泰斗

——记内科学家 张孝骞

金大劼 张 燕

“协和泰斗”，湘雅轩辕，鞠躬尽瘁，作丝为蚕，待患似母，兢兢解疑难。“戒慎恐惧”座右铭，严谨诚爱为奉献，功德堪无量，丰碑柱人间。

战乱西迁，浩劫逢难。含辛茹苦，吐哺犹鹃，袍学如子，谆谆无倦厌。惨淡实践出真知，血汗经验胜宏篇。桃李满天下，千秋有风范。

北京协和医院的这副挽联，精辟地概括了张孝骞一生崇高的品格和对祖国医学事业的杰出贡献；也表达了全院职工对他的敬仰和深深的怀念。

张孝骞(1897—1987)，字慎斋，出生在长沙市的一个清寒的教员家庭。他少年时就读于私塾，辛亥革命后，升入长郡中学。祖父对长孙教育非常严格，要求孩子忠诚老实，循规蹈矩，不允许有任何越轨行为。张孝骞认为自己持之一生的严谨作风，正是从祖父的教育开始的。

长郡中学是长沙一所颇有名气的公立，中学师资条件相当好。张孝骞在学校里特别重视数、理、化、外语等功课的学习，并萌发了实业救国的思想。

1913年夏，由湖南育群学会和美国雅礼会合办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贴出的招生广告，强烈地吸引着张孝骞，湘雅校董、长郡中

• 作者根据《张孝骞》整理

学校长也劝他去报考。于是，他一改初衷，决心做一名救死扶危的医生，以雪“东亚病夫”的国辱。1914年9月，他和另外19名青年考取该院，成为饮誉中外的湘雅医学院的第一届门生。

张孝骞在湘雅求学，除了刻苦攻读，还时常关心国家大事，思虑民族危亡。针对时弊，他与进步同学一道发出了“快来救国”的呐喊。“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长沙，他和同学们一起立即举行为期两周的罢课，上街游行，声援京、津学生，随即，湘雅创办的《学生救国报》改名为《新湖南》周报和《新湖南》月刊，成立了新湖南社，张孝骞是14名成员之一。在1919年6月3日出版的《新湖南》上，张孝骞发表题为《公共卫生设施之程序》。认为“公共卫生关系人民之幸福、社会之安全者甚大”，提出要在中国普及卫生常识，“急宜举办卫生局外，广设医校以作育专门人才，推行医院，以徐图人民之信仰……。”青年张孝骞的爱国热忱已化为实际行动，要以医学来实现他的报国之志。

1921年6月，张孝骞的学业成绩和毕业论文双获第一，被授予两块金牌，载誉毕业，并第一个登台接受了美国康州医学博士学位证书。在留校工作的两年时间里，他任内科住院医、总住院医、助教，不仅出色地完成诊疗，而且勤于探索，发明了一种新的输液方法——腹内盐水注射。他的毕业论文发表在1923年的《博医学杂志》上，这是湘雅毕业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1923年9月，张孝骞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内科进修班学习。他除了学习外，还做一些临床工作和实验室里的基础研究。这种临床和基础结合，正是张孝骞所十分神往的，这使他萌发了一个念头：希望能凭借基础医学的研究，来开辟临床医学领域的新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认为这是一条十分广阔的道路，他自己就一直坚持在这条道路上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所以当协和医院内科主任、罗伯逊教授希望他留在协和工作时，他不在乎职务和待遇的降低，他看中的是协和良好的实验条件和那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因此决定留在协和。就这样，张孝骞推开了实验医学的大门。

1926年,张孝骞被选中去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深造。在那里,他对疾病时的呼吸、代谢、肾上腺功能等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血容量的测定一项研究尤为突出,为许多疾病的发病机制和治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他的学术论文《测定循环血容量的一氧化碳方法》和《糖尿病酸中毒时的血容量》,在美国临床研究学会年会上宣读后,受到了医学界广泛的重视,不久便为教科书所采用,年仅30岁的这位中国普通医生在世界医学界崭露头角了。

张孝骞并未为自己的成功而陶醉。一回国便又一头扎进了实验室和病房里,继续从事血容量的研究。他的第一项实验,是测定甲状腺功能异常的病人,证明了甲亢病人血容量的增加和甲低病人血容量的降低,为临床提供了直接的依据。接着,他又对肾脏病人的血容量开展了研究,证明某些肾脏病人(主要为肾病综合征患者)的血容量确实有大幅度的降低,不但结束了这一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对发病机理和治疗方法以及血浆蛋白与血容量的关系带来了新的认识。

30年代初,张孝骞受命在内科创立消化专业组。他一方面建立消化专业门诊,一方面开展胃分泌功能的研究。他撰写的《发热和传染病时的胃液分泌》再次受到医学界的普遍关注。该文提出了发热对胃分泌功能有抑制作用的新观点,从生理机能方面说明了发热病人不愿进食的机理之一;与此同时,在胃液分析上,他也作了相应的改进,成了我国第一个在临床上使用组织胺法化验胃液分泌的人。这种方法比原来采用的试餐法更可靠。

1932年,张孝骞以他出色的工作成绩晋升为副教授。第二年,再次到美国,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布龙菲尔德教授的实验室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胃分泌功能的研究。回院后,他仍担任内科消化组的领导,一方面从事临床工作;一方面继续进行胃肠疾病的研究工作。他决心向这座实验医学金字塔的顶尖攀登,并为此充当一名勇敢的开拓者。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他不愿充当侵略者的工具,

毅然放弃在协和医学院优厚舒适的条件，停止了进行多年的、卓有成效的科研工作，全家轻装南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共赴国难。几经辗转，回到了湘雅，受到了母校的热烈欢迎。先后担任内科学教授、教务主任、院长等职。1938年夏，战火逼近长沙，张孝骞不顾美国雅礼会的反对，力排众议，决定将学校内迁。他率领全校师生员工，携带必要的仪器设备、图书，跋山涉水，在贵阳的山沟里办起了流亡大学，克服了经费、校舍、人才、设备等难以想像的困难。他一人肩负行政、教学、医疗三重任务，率先减薪一半，和大家同舟共济，艰苦奋斗，坚持把学校办下去，并培养出了一批合格的医学人才。1944年，学校被迫再次搬迁至重庆。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第一次以中华民族的胜利而告终。在胜利的锣鼓声中，张孝骞筹划着将湘雅迁回长沙，1946年夏天，迁校任务全部完成，美国国务院邀请张孝骞去讲学。他在美国逗留了一年。讲学之外，他还考察了美国的医学教育，了解国际上医学进展情况，同时为人手奇缺的湘雅聘请一些教师，并把战时中断了的医学期刊尽可能补齐，以充实湘雅的图书馆。

1948年春，张孝骞辞去了湘雅医学院院长职务。不久，应北京协和医院院长的聘请，决心回到协和工作。当年9月，张孝骞偕同妻子，迎着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绕道上海、天津，回到了阔别11年的北平。当协和医院那灰砖绿瓦的建筑又重新出现在眼前时，张孝骞思绪万千，深感责任重大。他一放下行李，就和同事们一道清理房间，修复设备，安排医学院的课程，筹划内科的建制。他从美国请回了消化系专家文士域、心脏病学专家黄宛、传染病学专家张学德等人，并把内科分成消化、心肾、传染、血液、呼吸等专业组，促成了内科学分支学科的专业化，开始了全面的科研工作，医学院的教学工作也较快地走上了正轨。

1951年初，当人民政府接办医院的时候，张孝骞领导的内科已经呈现出蒸蒸日上的面貌。他也以极大的热情，听从党的安排，投入到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中去。他参加过土改工作团，湖南医疗